

中国古代 文学论稿

胡念贻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论稿

胡念贻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论稿

胡念贻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2 印张 16.25 字数 325,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统一书号：10186·745 定价：4.60元

目 录

《尚书》的散文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
《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	21
贾谊和他的散文	77
论《史记》的文学价值	87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	113
宋玉和他的作品	121
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	135
汉代的诗赋	153
论汉代的“京殿苑猎”赋	163
《诗经》中的赋比兴	173
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	195
关于《胡笳十八拍》作者的争论问题	229
论宋诗	243
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编纂和流传	277
《宋百家诗存》及其与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关系	295

《唐宋词选》前言	307
陈人杰和他的词	327
关于后羿的传说	345
《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	367
谈《西游记》中的神魔问题	387
吴敬梓和他的时代	405
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425
关于《红楼梦》所继承的小说戏曲传统	439
后记	481

《尚书》的散文艺术及其在 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它的时代和《诗经》平行而更早。它是我国古代散文的源头，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人们对它的文学价值至今很少作过认真的研究。本文试图就这一方面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

《尚书》最早的名字叫做《书》。《左传》等书里面引《尚书》文字，常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书》是这四种书的总称。《尚书》的名称，据伪孔安国《尚书序》所说，是汉初伏生所加。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书》和《诗》是西周到春秋时代贵族子弟所必须修习的课目。当时的《书》，想必有一个共同的读本。战国时代儒家传授的《书》有一百篇，传说是孔丘所定。一百篇都有“序”，即所谓《书序》，传说是孔丘所写（《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秦始皇焚书禁学，济南伏生藏了一部《书》在夹壁里，但它在汉初也丢失，只找回二十九篇和《书序》。二十九篇中的《泰

誓》后来也亡。今天我们见到的《尚书》只有二十八篇。因为它是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故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又从鲁共王宅坏壁中发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可惜“古文《尚书》”在晋代亡佚了。

我们今天研究《尚书》，就是研究“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我们想要知道秦以前《书》的篇目情况，就只有依据百篇的《序》。《书序》虽然不一定是孔丘所作，然它至少是出于战国时代儒生之手。

秦以前的《书》百篇中，《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这个数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它这样整齐划一，可见确是经过了有计划的编订；二、《商书》和《周书》各占四十篇，可见商代留下的文献确是不少。

《虞夏书》我们今天还无法断定它是作于传说中氏族社会末期的虞和奴隶社会初期的夏，因为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当时是否有文字，更无法断定当时是否有了这样的书写文学水平。但是它的写作时代，可以推断不会晚于殷商西周，有的可能经过了战国时代学者的修改增补，如《禹贡》。为什么说不会晚于殷商西周呢？因为从《左传》里面知道春秋时人常把它当作虞夏时代的书来称引，而且在《尚书·周书》里面也称引到它，如《立政》，

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忧恂于九德之行。”

这里说的“九德之行”，出于《皋陶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
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

义。……”

周公举出“九德之行”，不加任何解说，可见《皋陶谟》的“行有九德”，已为周初人所习知。又如《吕刑》说：

乃命三后恤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

这也是出于《尧典》。《尧典》中说伯夷“作秩宗”（管秩序尊卑，即“降典”），禹“平水土”，后稷“播时百谷”。

禹“主名山川”，这里就有《禹贡》的影子。当然，《禹贡》所写到的山川地理，是否殷商西周人所已全部知晓，值得怀疑。因此有人认为它是战国时人作。然而战国时人对于一篇古地理书按照当时地理的新知识加以修改补充，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相信它可能有一个殷商西周的古本。

《商书》一般说来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由于有了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可以知道商代书写文学有了较高的水平。但是也有人看到甲骨文字那样简短，因而怀疑《商书》的可靠性，这个怀疑是过甚的。甲骨文由于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每一片可容纳的字数有限。而且它只是用来占卜的，无须登录更多的内容。尽管如此，甲骨文中也有长达五十字一片的，如：

癸巳卜，殷贞：旬亡(无)凶(祸)。王固(占)曰：翌(有)菴(祟)！
其翌来鼓(艰)。乞(迄)五日丁酉，允翌来鼓自西。沚罚告曰：土方
(部族名)正(征)于我东鄙(鄙)，戈(灾)二邑；臣方(部族名)亦牧我
西鄙田。(罗振玉《殷虚书契精华》第二片)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殷代的散文写作所达到的水平。它写得简洁而具有一种参差错落的韵味，作者不仅记下了这些事，而且运用了他的写作技巧。这一段文字和《尚书》

中的殷商西周文字都有相似之处。

在现存二十八篇中，《虞夏书》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四篇，《商书》有《汤誓》、《盘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七篇，其余都是《周书》。《商书》中除《汤誓》外，《盘庚》以下诸篇的时代都是属于殷商的后期，和甲骨文的时代相当。《汤誓》一篇，也难断为伪托。《商书》中关于汤伐夏的篇目有《夏社》、《疑至》、《臣扈》、《汤誓》、《典宝》、《仲虺之诰》等。周公姬旦在《多士》中告诫商的“众士”时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指出殷朝的典册中记载了“殷革夏命”的事；《汤誓》等篇应当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这些如果不是汤伐桀时留下的文字，它们总是出于殷人之手的。

二

《尚书》中的文章主要是一些政治应用文字，它们大部分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中产生的，是为了阐释政府或某个执政者的观点而写作的。这样的文字一般说来不容易具有艺术性，更不容易对后世的散文写作发生影响。然而《尚书》中的一些篇章却成为散文的典范。从殷代盘庚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经历的时间有七、八百年，其间政治事件很多，而留下的文字却只有这么二十多篇。这些文字在漫长的年代中经历了考验。这除了它的内容有重要的历史性外，还由于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吸引了读者。

《尚书》的散文艺术，可以分以下几点来谈：

一、有些篇章写得富有感情，从感情的流露中表现了作

者的自我形象。这可以盘庚、周公、秦穆公三人的作品为例。

盘庚迁殷在当时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遭到了“百姓”、“万民”的反对，而鼓动“百姓”、“万民”起来反对的，就是那些奴隶主贵族。盘庚为了消除这种阻力，作了三次讲话，这就是《盘庚》三篇。

第一篇讲话（即《盘庚》中），是盘庚作出迁都决定后所作。他告诫那些反对迁都的人：“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和）乃心，钦（敬）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穷）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朽）厥载（指舟）。尔忱不属（注），惟胥（相）以沈。”这是用感情来打动那些反对者。

第二篇讲话（即《盘庚》上），作于初迁到殷时期。这时一些人不喜欢这个新都（“民不适有居”），盘庚就召集一些贵戚大臣，对他们说“今汝聒聒（拒善自用之意），起（兴）信险（邪）肤（浮言），予弗知乃所讼（争）。非予自荒兹德，惟汝舍（通行本作“含”。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说：“史公约此文云，‘舍而弗勉’，则当为‘舍德’。”按：孙说是。）德。”“汝克黜（去）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承受）其恫（痛），汝悔身何及！”说得很剀切。

第三篇讲话（即《盘庚》下），作于在新都安定下来之后。盘庚勉励他的臣民：“无戏怠，懋（勉）建大命。今予其敷（布）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无）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度）哉！予其懋简（阅）相（视）尔，念敬我众。”这都是带着诚恳的心情在安抚他的臣民。

《盘庚》三篇，可以说都是“敷心腹肾肠”之作。其中有各种激切的言词，也有慰勉的话语。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盘庚的劳心焦思，也可以看到他的深谋远虑。一个有远见有作为的君主形象就这样显现出来。

《尚书》中周公的作品最多（以下这些文章根据《书序》和《史记》，都可相信是周公作）。周公在周初建国时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他的文章，都是在当时政治斗争中产生的。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乱；周公兴师东征，用成王的名义写了一篇诰令，这就是《大诰》。管蔡之乱平定以后，周公封康叔于殷墟，又用成王的名义写了三篇文字告诫康叔，这就是《康诰》、《酒诰》、《梓材》。摄政七年之后，周公营建洛邑，还政于成王，又写了《洛诰》。他在营建洛邑时，迁殷民于洛邑，又用成王的名义，写了一篇告诫殷“众士”的文章，这就是《多士》。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作了《无逸》。他为了消除召公奭的怀疑，以期作到和衷共济，就作了《君奭》。他在平定奄国之后，又用成王的名义写了一篇“告四国多方”的文章，这就是《多方》。成王临朝亲政时，他又作了一篇勉励成王的文章，这就是《立政》。

这些文章，都注入了周公的感情。他的感情不仅表现在文章中许多的“呜呼”和“已，予惟小子”一类的感叹词句上（这些感叹词句当然都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于周朝基业惟恐坠失的兢兢业业的心情上。周公在武王死后支撑着很艰难的政治局面，所谓“天降戾于周邦”。周公一方面要用军事力量镇压殷民的反抗和管蔡的叛乱，一方面要调整内部的关系。他的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目的就是要鼓动和感召当时的人们，促使他们来维护和巩固周朝的政权。他的文

章的内容主要就是这样两类：一是总结夏殷两代特别是殷代的兴亡经验；一是讲“天命”没有一定，只有有德能的人才能享有“天命”，所以要求“保民”、要求“无逸”，等等。内容比较简单，写得却是低回感叹，以情来动人。所以过去有“周情孔思”（见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之说。周公的文字写得带有感情，这对于周公政治思想的传播，在当时和后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穆公的《秦誓》也是一篇富有感情的文字。

秦穆公不听谋臣蹇叔之言，命百里孟明、西乞术、白乙丙帅师伐郑，为晋所败于殽。秦穆公迎接败归的军队，作了《秦誓》。文章里面充满了悔恨的心情。它一开头就用这样一种语调：“嗟！我士，听无譖。予誓告汝群言之首（众言之本要）。”接着说：“民讫（止于）自若（顺）是多盈（乐）。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表现出了忧思的深重。文中用了一些排笔，如“番番”（白发）良士，旅力既愆（失），我尚有（亲）之；仡仡勇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表示今后接受教训信用老成谋国之士，语句中带着一种低回沈痛之感。这篇文章更加注重运用语言的手段来表达作者自己的感情。

二、《尚书》中的文字在叙事方面也具有特色，在当时说来，它在这一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过去一些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尚书》只是记言，说不上叙事。其实记言和叙事总是不能分割的。《尚书》中诚然主要是一些执政者的文告和一些发议论的篇章，然而也有一些叙事的文字。

《尚书》中有的篇章看起来是记录言辞，其实是叙事，如《商书·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讫（止）我殷命，格（正）人元（大）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助）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安）食，不虞（度）天性，不迪（用）率（法）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摶（至）！’今王其如台（何）？”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返），曰：“呜呼！乃罪多参（森列）在上（天），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就）喪，指（是）乃（你）功（事），不无戮于尔邦！”

这篇文字叙述了周文王征伐黎国以后在殷商引起的反应。“祖伊恐，奔告于王”，这七个字描绘出了在殷人看来情况是多么严重！祖伊的一段话实际是叙述了殷纣政权下危机四伏的情形。殷纣的回答很能表现他的个性，而且带着时代的特点。当时是相信“天命”的，殷纣自以为得到天的辅佑，没有人敢动他，所以那样自信。祖伊清醒地看出了殷朝的最终将不免于灭亡。这样一段既有故事又有人物个性的对话，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它出现的时代是那样早。

《周书》里面的《牧誓》、《金縢》、《顾命》三篇文章，在叙事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成就。

《牧誓》是武王伐纣在商郊牧野所作的誓师之辞，开头一大段写了誓师的情景：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远）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举）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这几个字里，写出了誓师的时间、地点和场面，写出了武王誓师时的动作和语调。文字是那样简练，笔意是那样刚劲。两、三千年来的誓师的文字很少能企及。

《金縢》写了一个带神奇性的故事。武王有病，周公和史官们设祭坛，写了一篇祝文，向祖先祷告，愿以身代。将祝文藏在“金縢之匮中”。隔了一天，武王病就好了。周公后来被谗，受到成王的猜忌。周公卒后（“周公卒后”，《金縢》无此文。《金縢》前后有不衔接处，疑有脱文。这里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和《尚书大传》等书补。）有风雷之变。成王启开金縢，发现周公的祝文，感动涕泣，举行“郊”祭，风就停息了。这篇开头写：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二公曰：“我其为王穆（敬）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寥寥几句刻画出了周公的形象。这里妙在“未可以戚我先王”一句很传神。周公已经打定主意要向神祷告愿以身代，因此他不同意二公的卜卦，认为这样徒然使先王“在天之灵”忧戚。他也不把自己的主意向二公透露，只这样含蓄地说了一句，下面他就和史官一道去做祷告的事了。文中写风雷之变一段：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质）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懿（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勿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亲迎（迎周公之丧），我家国礼亦宜之。”

王出郊（郊祀），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这一段写天变如画。它写成王，写诸史与百执事，写二公，也都清晰生动。诸史与百执事遵守周公之命保密那么多年，二

公及成王蒙在鼓里那么多年，一旦宣露出来，他们的神态不是都形容毕肖吗？

《顾命》分上下篇：上篇写成王临终时的情景；下篇写康王嗣位的仪式。写成王临终时：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及洮颍水（洗发和洗面）；相（太保奭芮伯等人）被冕服（替成王披戴）；凭玉几（成王靠在玉几上）；乃同（召集）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危），疾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

这里从成王的生病写起，写他在生命垂危时刻召见文武大臣嘱托后事，写得很入细。它对于成王重病中，召见前的生活细节，对于成王弥留之际说话的气短句碎，都有传神的摹写。下篇写康王在丧事中嗣位的仪式也都很细致。它是那样轮廓清楚地叙述了各种陈设和仪卫，然后写康王和大臣、太史们穿着不同的服装从不同的地点上来各就各位，举行仪式。最后“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叙述到此结束。文章详细地叙述了从成王患病、死亡，到康王嗣位的整个过程。我们读了它，象看到一部大型纪录影片。这在古代是这方面不可多得的记录文献。

三、《尚书》各篇在语言方面都是精心不苟和具有它的特色。

《尚书》中的语言，由于时代最古，不但和今天距离很大，和战国秦汉时也很不相同。司马迁《史记》在采用它时，也要作一些适当的翻译。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慨叹《尚书》的“训诂茫昧”。《尚书》中错字脱简、诂训难通之处是不少的，这造

成了我们阅读的困难。然而只要我们读懂了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尚书》各篇的作者用字造句已都很讲究，他们不愧为很好的散文作家。

在《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散文风格。如《盘庚》，

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善），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过）罚。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供）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这是多么流畅。又如《酒诰》的开头：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殷墟，康叔封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浩迹（敕）庶邦（众国）庶士（众朝臣），越少正、御事（管事之臣），朝夕曰：祀兹酒（祭祀用此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降下教命，作此酒本来是为了大祀）。”

这里的起笔是多么刚劲挺拔。又如《梓材》：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亩（耕），惟其陈（治）修，惟厥疆（作界）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壁（垩色）茨（盖屋的茅苇）。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涂丹臙（彩色）。

这里有色彩鲜明的辞藻，又有骈俪的语句。又如《君奭》：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聿）惟兹有陈（道），保又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

这里的语句有整有散，写得错落有致。

《尚书》中的语言总的说来具有朴素、典雅、简练的特点，然而它并不古板。它的技巧是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的，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因此艺术风格还是显得丰富多样。

《尚书》文字有难易二种。朱熹认为：“有一般如今人书简说话，杂以方言，一时记录者；有一般是做出告诫之命者。”（《尚书纲领》）换言之，前者是口语记录，后者是文人手笔，故前者难懂，后者易懂。然而朱熹所举后者的例子都是伪古文《尚书》，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类，因此朱熹之说并不可信。一般说来，《尚书》中说理文字难懂，叙述文字比较易懂。例如《无逸》，前面叙述历史部分好懂，后面说理部分就多费解了。

四、《尚书》中许多篇很注重结构，在命意谋篇上下过工夫。

在结构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篇之中常常用许多“周公曰”，“王若曰”之类，粗粗地看去，似乎这些篇就是周公或成王等人的一些谈话记录，结构上似乎不严密；这种看法是并不符合《尚书》实际的。

我们如果仔细寻绎这些篇章，就会发现这些篇章都是结构严整、层次清楚的。加进“周公曰”或“王若曰”的地方，都是一些段落的开头。这是《尚书》一些篇在结构上的一种特殊形式，并非这些篇没有完整的结构。

举《无逸》篇为例。这篇第一个“周公曰”以下是一篇文章的引论，讲“君子”应当“知稼穡之艰难”。第二个“周公曰”以下是举殷代中宗、高宗、祖甲等“知稼穡之艰难，闻小人之劳”的事迹，说他们因此都享国长久。其后一些帝王则不然，因此都享国短暂。第三个“周公曰”以下述文王勤稼穡。第四个“周公曰”以下讲以后继承王位的不要贪安逸乐，要以殷纣为鉴。第五个“周公曰”以下讲一些“小民”变乱先王法度，以下讲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等知道正确对待这些小人，